

·祝贺师昌绪院士80华诞·

师老教我办委刊

祖广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北京100085)

1986年8月我刚调到基金委工作时,在政策局(当时称“发展战略与政策局”)工作。此时师昌绪院士作为基金委的副主任,分管政策局的工作。师老提出,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不能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很快委务会开会同意了创办基金委机关刊物——《中国科学基金》,师老负责领导期刊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第一届主编。我本人则被安排做委刊编辑部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当时还是个新生事物,她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基础研究组织国家项目、实施科学基金制的成功经验,是我国科技拨款体制改革的产物。基金委的工作不同于我国现有的任何行政机关,到底应当把委刊——《中国科学基金》办成一份什么样的刊物?我自己从学校的科研岗位调到基金委机关工作,没有任何的办刊经验,心里没底。对此,师老明确指出,委刊应当有别于其他部委的机关报刊,要定位于学术指导类期刊,应当成为基金委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应当成为沟通基金委与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桥梁;委刊要体现学术导向和管理的双重功能,她要向社会各界展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资助项目研究活动的重要进展和优秀成果,向广大承担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科学家提供有价值的各类信息,努力为科研人员服务。师老还鼓励我说,你作为从科研第一线调来的青年人,取得过一些成绩,拿过国家发明奖,这就是你办好刊物的良好基础。因为你了解科研人员,你就应当知道该如何为他们服务…。师老的这些话也就成了我们后来办好期刊不尽的动力。

师老的工作作风是与众不同的,无论是对自己所负责分管的工作,还是其他社会工作,他都是实行目标管理,对委刊工作也是如此。他说,办刊物的方式实际是很传统的,促进期刊的发展,能赢得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的关注,就是最好的方式。

对创办委刊,他只是在每年的年底过问一下全年的组稿编辑情况,帮助我们制定下一年度的组稿方针。平时的具体工作过程,师老基本不怎么过问,他希望让青年人在实际的工作中锻炼自己,放手让工作人员自己去发挥潜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师老这样的工作作风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干具体工作的年轻人也是具有很大的压力,深感身上责任的重大。但是,每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自己不能排解的困难时,师老总能及时地给予帮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师老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无论他多忙,任何人只要有事找到他,师老从不会回绝。师老慈祥和蔼的待人态度是出了名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火的样子。其实,基金委机关和其他单位也没有什么两样,有些人对科技期刊工作冷眼看待,自己时常感到工作有些不顺。因此,不论我是带着什么样的情绪走到师老的办公室,都会被他那关心下层、大智若愚的精神所感染,心情顿时舒畅。师老的记忆力非常好,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包括家庭情况等他都能记住,并且经常关心,使人总能有一种亲切感。

基金委成立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国家财政每年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长不多。另外,国内外科技界有些人士对基金委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1988年春天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部分代表和委员对基金委的工作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基金委很认真地进行及时的答复。师老对此十分关注,他认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代表了广大科学家的声音。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关爱,基金委应当重视这方面问题,要让更广大的科研工作者了解我们基金委的态度。在师老的指示下,这一年夏天,我们政策局的所有工作人员分别参加了各个科学部的学科评审会,配合科学部的同志广泛征询科学家们对基金委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回到北京后,由我们的委刊编

本文于2000年12月18日收到。

编辑部把这些反应意见进行了系统整理,师老亲自动笔,以答记者问的形式,撰写了一篇很有份量的文章——“基金委负责人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有关政策和几个具体问题”,很快在委刊1988年的第4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师老不但代表基金委领导回答了广大科学家的问题,还提出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问题,希望结合“四化”需要确定基金委的学科发展重点和应采取的措施。明确提出将据此指导《项目指南》的修改工作。

1988年10月27日,师老与唐敖庆主任、王仁副主任以及徐光宪院士等接受了《光明日报》和委刊编辑部记者的采访,就我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谈话。《中国科学基金》曾在1989年第1期全文发表了这篇谈话纪要。在当时我们的国家财政并不宽余,“八五”计划即将开始实施,各个方面都渴望得到国家财政的经费支持。社会上对国家花费大量经费去支持一时见不到经济效益的基础研究有各种议论。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基础研究不一定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大益处,因而建议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可以缓点搞。其根据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不重视基础研究,但仍然发展迅速;相反,英国很重视发展基础研究,但其工业却越来越落后。师老等委领导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我国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有很多的不同,我们不能模仿他们的作法,走他们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况且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必须在实行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的同时,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毫不放松地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基础研究,单靠引进、引进,再引进也是不能使我们赶上先进国家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过许多经验和教训。师老等基金委领导所发表的这次谈话,和其后师老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科技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后来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投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师老恰当地利用《中国科学基金》—基金委委刊的特殊地位,使之发挥科研导向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1990年年底,几位国际知名科学家、著名研究所在科研成果上弄虚作假的事件震惊国际学术界。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致函我委领导,他在信中指出:利用公款的支持机会,弄虚作假,欺骗荣誉,不仅外国有,中国也会有,应该适时予以揭露,给予处理,以培养和规范科学界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对人类负责的精神。师老作为委刊主编及时要求编辑部组织一批揭露在国际上引起轰动的弄虚作假的典型案例分析文章,发表在《中国科学基金》期刊上。同时在他的指导下,本刊编辑部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提倡科研道德,严肃科学学风,杜绝科学研究中的作假行为”的评论文章,有力地配合了这批文章发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警示作用。

师老关心科技期刊工作并不是工作所迫,而是发自内心的倾注。后来他卸任不再担任《中国科学基金》期刊主编,也还是经常关心委刊的工作。师老的工作作风对我本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自己担任了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新来的青年人,我也放手让他们开拓工作,建立起一种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在师老的悉心指导帮助下,在编辑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科学基金》期刊办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基金委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连续获得“国家优秀期刊评比”二等奖。1993年又创办了委刊的英文版——《SCIENCE FOUNDATION IN CHINA》,更大范围地宣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扩大了基金委的国际影响。

无论是《中国科学基金》,还是1990年由师老创办的另一份由基金委主办的期刊——《自然科学进展》,他都是备加关心爱护的。师老在国内曾创办了好几种学术期刊,他对科技期刊工作情有独钟。提高国内学术期刊整体质量,尽快与国际接轨更是师老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希望通过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